

6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报告预计,2017 年和 2018 年全球经济活动将加快, 预计增速将分别达到 3.4%和 3.6%。值得一提的是, 考虑到政策支持等因素, 报告特别上调了中国 2017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从去年 10 月份预测的 6.2% 上调至 6.5%。



报告认为, 未来一年全球增长前景面临双向风险,但评估显示风险偏于下行,特别是在中期内尤为明显。在经历了 2016 年的低迷不振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美东时间本月 16 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预计,2017 年和 2018 年全球经济活动将加快, 预计增速将分别达到 3.4%和 3.6%。其中,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预期加快被认为 是 今 明 两 年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支 撑。值得一提的是, 考虑到政策支持等因素,

报告特别上调了中国 2017 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 10 月份预测的 6.2%上调至 6.5%。与此同时,受私人投资疲软影响,同处东亚的印度, 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被下调 1 个和 0.4 个百分点。与历次报告不同, 最新发布 的 报 告 罕 见 地 开 篇 即 强 调 政 策 不 确 定 性 可 能 导 致 本 次 针 对 全 球 经 济 的 预 测 可 能 出 现 较 大 偏 差。“鉴于美国新政府政策态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产生的全球影响, 经济预测可能出现差异很大的结果。随着美国政策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变得更为清晰,到 2017 年 4 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发布时,预测所依据的假设将更为确定。”报告称。

全球增长前景面临双向风险 下行风险略占上风

报告认为, 未来一年全球增长前景面临双向风险,但评估显示风险偏于下行,特别是在中期内尤为明显。近期政治势态突出表明,对跨境经济一体化好处的共识在减弱。如果政策重大转变导致全球失衡扩大、汇率变动加剧,保护主义压力会进一步强化。对全球贸易和移民的限制增加,这将损害生产率 and 收入、对市场情绪产生不利影响。在资产负债表依然受损的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长期不足以及改革进展不充分有可

能导致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永久下降,对债务动态造成不利影响。此外,其他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依然存在潜在脆弱性。企业债务高企,利润下降,银行资产负债表薄弱,政策缓冲单薄,这些因素意味着,这些经济体仍易受到全球金融环境收紧、资本流动逆转以及货币大幅贬值产生的资产负债表效应的影响。

与此同时,地缘政治风险和各种其他非经济因素继续影响各地区的经济前景——中东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国内战争和冲突,在领国和欧洲的难民和移民所处的悲惨境遇,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行动,东南部非洲干旱的持续影响以及寨卡病毒的传播。如果这些因素强化,受直接影响的国家将陷入更深的困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恐怖主义的加剧也会对全球市场情绪和经济信心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从上行风险看, 报告认为美国和中国政策刺激对经济活动的支持力度可能大于当前预测反映的水平,这也会促使其贸易伙伴的经济活动更强劲地回升,除非正向溢出效应受到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的抑制。上行风险还包括,如果对全球需求复苏的信心增强,投资也将扩大。

不同经济体优先任务各有不同

2017 年中国楼市总体将平稳回落

■ 许岩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专家认为,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加快放管服改革步伐这两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

过去一年在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任务中存在的难题和困境,依然会成为 2017 年供给侧改革的挑战。潘建成形象地比喻,坚定不移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好比将已经比较吃力的拳头收回来,积蓄能量。那么,再次出拳将会更加有力量,也会更加精准有效。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工作的布局也可以看出,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业内的专家更是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创新点在于制度供给。

比如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提出的,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农村产权制度、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方面都提出了要求。

“在深化供给侧改革中,要以制度供给为龙头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贾康说,一方面,在继续深入进行‘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还要抓紧实施、推动一批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基石建设的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行政架构改革、司法改革等,以为那些从落后过剩行业内动态释放出来的要素创造自由流

正如报告开篇即强调的,受制于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长弱于预期的可能性很高,而事实上近几年增长预测也有屡屡下调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到周期性状况和政策空间的差异,不同经济体的优先任务各不相同,IMF 对不同经济体的政策建议也有所不同。

在产出缺口仍然为负、工资压力较小的发达经济体,持续低通胀的风险依然存在。因此,必须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并视情况采取非常规战略。“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本身不足以充分提振需求,因此财政支持对于形成增长势头至关重要。”报告也强调,“如果不能推迟财政调整,则应校准其步伐和结构,以尽量减轻对产出的拖累。”

对于不存在显著负产出缺口的发达经济体,任何财政支持都应着眼于增强安全网(在一些国家包括促进难民融合)以及通过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和有利于供给的公平税收改革来提高长期潜在产出。在这种情况下,得到有效锚定的通胀预期能使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保持渐进步伐。

更广泛而言,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须辅以能够抑制潜在增长减弱的结构性改革,并为这种改革提供支持。相关的结构性改革措施包括:提高劳动力参与率,鼓励对技能的投资,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匹配过程,放开对封闭职业的

动、优化重组的环境和条件。

“因为经济增长过程的实质就是要素不断寻得到更高回报的过程,要使经济更好增长,就必须要为要素寻求最大回报创造更加自由、灵活的制度条件与公平竞争机会。”贾康进一步解释。另一方面,结合当前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特征,优化配置的要 素 必 将 较 多 地 集 聚 在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新经济行业上,可以说新经济的发展程度,是衡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程度的主要标志。

阻断“脱实向虚”

最近这几年金融市场庞大的资金和信贷,不断分流到股市、房地产以及文化古董市场,根本就没有流入实体经济。中国经济“脱实向虚”,国企的高杠杆、高负债,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 最大风险之一。

业内人士指出,为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良好的宏观环境,2017 年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指出,2016 年,我国经济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经济过度金融化和房地产化导致经济风险加大。资金“脱实趋虚、脱中趋美”倾向严重。所以防范金融风险将成为 2017 年经济工作的一大重点。

以国企的高杠杆、高负债来说,据中央财

准入,加强产品及服务市场的活力和创新以及促进包括研发投资在内的商业投资。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对的周期性状况和结构性挑战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说,加强金融韧性能够降低对全球金融环境收紧、汇率大幅波动和资本流动逆转风险的脆弱性。非金融债务庞大且不断增加,对外负债未得到对冲、或严重依赖短期借款为长期投资提供融资的经济体,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和控制资产负债表错配。

报告指出,由于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疲软、政策空间有限,需要在几个领域继续采取多边行动,以尽量减少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维持全球生活水平的改善。这项工作必须在若干领域同时推进。为了更广泛地分享经济一体化的长期好处,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采取针对性强的举措,帮助那些受到贸易开放不利影响的人,并促进他们在不断扩张的经济部门找到工作。为保证经济公平,还必须在多边和国家层面采取措施,打击逃税,防止避税。与此同时,必须继续努力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包括在必要时对有关机构进行注资和清理资产负债表,确保具备有效的国家和国际银行处置框架以及应对非银行中介正在形成的风险。一些国家具有稳健的经济基本面,但有可能受到跨境蔓延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加强全球安全网能为这些国家提供保护。

2016 年已经过去, 尽管最终的年度经济数据还没有出来,但全年经济增速“L 型”的态势已基本确立。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表示,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预计中国 2016 年经济增 6.7%, 在主要经济体中依然是最高水平。

而人们更关心的是,在 2017 年,中国经济的“L”型调整还需要多久? 2017 年经济增速会否再下台阶? 6.5%左右的增速能否守住? 供给侧改革怎么深入? 怎么样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看来,2017 年中国经济可望延续 L 型走势,继续保持 6.5%左右的增长。供给侧改革继续深入,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加快放管服改革步伐这两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

增速或保持 6.5%左右

对于 2017 年经济怎么走,在业内专家看来,2017 年经济下行压力或许比 2016 年更大,但伴随着转型升级新动能的逐渐形成,我国经济可望延续 L 型走势, 经济增长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下滑。

“2017 年中国经济增速保持 6.5%左右的增长还是很有希望的。”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如此判断。他表示,2017 年经济下行压力或许比 2016 年更大,但伴随着转型升级新动能的逐渐形成,我国经济可望延续 L 型走势, 经济增长不至于

“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研讨会观点综述

2016 年 11 月 5 日上午,北京论坛(2016)分论坛六:“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角色”B 组分三场研讨会。第一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场, 分别由香港大学邱东晓和华中科技大学张建华主持。共有 7 位学者在讨论会上发表演讲,分别为香港大学赵志刚、日本学习院大学 Tomohiko Inui、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Antonio Rodriguez-Lopez、邱东晓、美国华盛顿大学的 Kia-yiu Wong、印度尼西亚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 Lili Yan Ing 和张建华。

上半场一共有四位学者发言。首先,赵志刚发表了题为“中美贸易对美国政治选举的影响”的报告。其研究组利用中国不同产业适用的美国税率差别,采用差分法和断点回归设计,评估了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变化对美国县级选举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综合税率变化越大的县在政治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吸引的投票份额显著更大。与该事实相一致的另 一 研 究 成 果 为, 民 主 党 人 更 倾 向 于 支持不利于贸易和促进经济援助的法规。

Tomohiko Inui 的报告题目为“日本零售企业外包对于国内生产企业的影响”。他和其合作者合并了日本制造企业的财务信息和企业对应的下游零售企业之间匹配的销售网络信息,并比较了零售企业是否是进口企业对其上游供货企业的生产率和成本加成的差别。为了克服潜在的样本选择性问题,他们采用了结合差分的倾向性匹配得分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当对应的零售企业开始从国外进口时,其上游供货企业会出现显著的成本加成、生产率和销售量下降,但是这些企业和工资水平没有受到显著影响。

Antonio Rodriguez-Lopez 发表了关于

“工作流动和全方位贸易自由化:中国的理论与实证”的报告。基于国际贸易中的 Metitz 模型,他推导出了异质性企业在税收水平下降后容纳的就业水平变化。高生产率企业在平均的出口关税水平下降后应该有就业上升;低生产率则相反。此外,相比于投入品税率或外部最终品税率,企业的就业对于内部最终产品税率的变化更为敏感。内部最终产品税率的下降对不同类型企业作用类似;外部税率的下降对于纯加工企业的影响最大;投入品税率的影响则主要作用于进口企业。

邱东晓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国际贸易视角的考察”为主题进行了报告。他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并综合已有的研究,总结了中国的国际贸易对于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国家的影响。中国的进口以资本品、中间品和原材料为主,出口中消费品占据最大份额。中国的贸易为 GDP 的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间工资不平等程度和地区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对于亚洲国家,中国的贸易增长对主要出口消费品的国家呈现整体负面影响,而对主要出口资本品的国家呈现正面影响。中国的贸易还加速了拉丁美洲产业升级。对全球整体而言,中国的贸易呈现正面影响。

下半场开始,Kia-yiu Wong 为大家报告了“中国的产能过剩和出口”相关的内容。首先他向大家具体介绍了“产能过剩”的定义,即企业或行业的生产能力大于市场的消费能力。接着,他利用图表为大家讲述了产能过剩的原因。他指出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政府应该做的是促进企业在最优的产能水平上生产。

Lili Yan Ing 的报告题目为“中国企业质量竞争对印度尼西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合企业的出口数据和印度尼西亚制造企业的数 据, 她 和 她 的 合 作 者 构 建 了 一 个 衡 量 进 口 产 品 质 量 的 指 标。根据这一指标,她发现从中国进口的产品质量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印度尼西亚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面临的竞争,从而显著提升了印度尼西亚企业的生产率。

张建华的报告题目为“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兼论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他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自主创新三个概念入手,论述了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通过理论推导,他发现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于国内和国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创新行为有着不一样的影响。他认为,政府应该同时采用需求驱动和技术驱动的政策,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B 组第二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举行。一共有七位学者在本次研讨会上发言,分别是来自联合国的杨文艳,日本爱知大学李春利,新加坡国立大学 Shi Xunpeng,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Jack Hou,北京大学徐晋涛,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陈恭平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洪俊杰。本次研讨会分上下两个半场,分别由 Jack Hou 和洪俊杰主持。

杨文艳的报告题目是“包容型增长对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数亿人民成功摆脱贫穷。然而,繁荣并没有实现共享。西方国家政治上不满情绪上升,全球极端主义不断增加,包容性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所以不平等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发展也应该坚持包容的原则。一个普适性的政策是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因为它可以应对社会不公正的问题。

李春利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汽车社会成本中的交通拥堵分析与“东京模式”。针对目前国内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严重的现象,李春利结合东京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可能的方法“东京模式”。该方案一共分为三部分,分别为:第一,重视立体轨道交通;第二,建设“副中心”,引导“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第三,重视“交通需求管理”的理念,抑制私人小汽车增长。他说:“交通需求管理和大禹治水的策略是一脉相通,你光在下游建坝堵水是远远不够的,造成堵车的根源是城市中心单一化,要分流泄洪,因势利导,然后才能达到疏而不堵。”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合作发展战略之后,学术界也做了许多关于该方面的研究。Shi Xunpeng 和 Jack Hou 分别就不同的层面,对“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解析。Shi Xunpeng 发言的主题是“东南亚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 能源投资的案例研究”。他指出,“一带一路”可以在合作基础上实现多方共赢,但不同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仍然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多边利益、政治环境等的复杂性,仍然有部分人士对东南亚“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存在怀疑的态度。他认为,大家应当摒弃偏见,树立所有权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从而更好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Jack Hou 的发言题目为“一带一路: 远水救不了近火?”他认为,为了应对目前中国国内经济问题,例如,中等收入陷阱、产能过剩等,中国在合适的时机提出了“一带一路”战

(下转 03 版)